

## 解讀習近平南巡的意義

###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for Xi, Jin-Ping's Trip to South China

李英明 (Lee, In-Ming)

中華科技大學副校長

習近平在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不到一個月，即於去（2012）年12月7日在汪洋、王滬寧等中共新任政治局委員陪同下，走訪廣東和深圳。由於2012年是鄧小平南巡20周年，習近平此舉被稱為「新南巡」，以與當年的鄧小平南巡相對應。而胡錦濤10年前就職時曾走訪毛澤東「革命舊地」西柏坡，相關評論也把胡、習上任的訪視動作加以比較，以凸顯不同階段，中共政治文化氛圍的不同。

在薄熙來尚未下臺前，大陸政壇最引人注目的場景，是薄熙來高舉唱紅打黑大旗和汪洋所標榜的開放路線相較勁。這種浮上檯面的路線較勁場景，雖然隨著薄的下臺而暫時消失，但薄、汪的公開式的路線較勁，的確顯示大陸政治頂層中的路線分歧曾經是非常鮮明的。

薄熙來敢於高舉唱紅打黑旗幟，除了其個性、行事風格和中共高層當時微妙的派系關係氛圍有關外，也顯示唱紅打黑存在一定的社會政治支持基礎。

習近平上任之始走訪廣東和深圳，當然可以被解讀為習近平未來的政策路線是持續向改革開放傾斜的。不過，人們關注的是，大陸未來到底能走或要走什麼樣的改革開放的路。

20年前鄧小平南巡，揭棄了帶有某種調和色彩的市場主義的論述，強調不管「走資」或「走社」都可以而且也需要市場。讓市場從「走資」或「走社」的二元對立的路線糾葛中跳脫出來，為「市場」免除了來自中共傳統意識形態包袱的糾葛。這一方面使「市場」從中共傳統意識形態的泥沼中活脫出來，但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的發展所延伸而來的市場失靈，再加上傳統的社會主義計畫體制餘緒

力量對市場失靈的利用，卻使大陸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同時，延伸出令人關注的嚴重貧富、區域差距和貪腐的負面現象。

市場發展重效率和效益，但相對的就會淡化或忽略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問題。貧富、區域差距和貪腐的現象屬於社會公平正義的範疇，只要這些現象存在或蔓延，人民就會質疑市場的機能，從而希望政府或公權力的介入，以求針砭社會的不公不義；在大陸，這種社會集體心理氛圍，很容易就會延伸成為某種懷舊情結，薄熙來在未下臺前所高舉的唱紅打黑旗幟，之所以會得到相當程度的社會政治支持，就反映這種懷舊情結的作用。

當年鄧小平南巡，重在釋放市場。而習近平此次南巡，在凸顯持續改革開放的象徵意義的同時，恐怕還得嚴肅面對如何整治市場失靈的問題。

綜觀20世紀以來人類歷史的發展經驗，計畫經濟固然會窒息經濟，但放任的市場經濟也會不斷造成經濟的危機。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的發生，基本上都與市場失靈有關。中國大陸從鄧小平南巡後，大幅度的釋放市場，一方面固然讓大陸取得讓人矚目的經濟發展成績，但另一方面也已經頻頻出現嚴重的市場失靈現象。上述嚴重的貧富、區域差距和貪腐的現象，都與市場失靈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習近平南巡後，其政策路線不可能再像當年鄧小平南巡那樣重在釋放市場，而是要重在如何治理市場。

當年鄧小平所採取的政策路線，在設法使農村和一些試點城市或區域能不斷的創造市場，然後再逐步迫使計畫領域進行市場化改革。而今在市場的迅猛發展的衝擊下，雖然中共仍然在形式上不願放棄土地公有的堅持；但是，大陸經濟現實的發展，所呈現的圖景卻是，中共必須重新嚴肅面對市場與計畫或社會主義的關係如何重新定位的問題。

面對這個問題，如果仍然重蹈覆轍，再去爭論到底市場為主或計畫為主，其實已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盱衡大陸目前情勢，市場治理應該被提到議程表上來。而在市場治理架構下，市場與計畫或社會主義的關係，當然還是重要的課題。

目前，導致大陸市場失靈，除了有來自市場邏輯機制的因素外，主要還有以下幾點：

其一、根源於中共論資排輩政治文化所延伸而來的相對特權階層，挾權介入市場或利用市場，以謀取利益。市場成為以權謀利或謀錢的槓桿或工具。紅二代

以權用市場謀利的傳聞不斷被報導和揭露，以政治特權干預市場，甚至造成市場失靈的現象，已達無法輕忽的地步。

其二、國有部門以體現社會主義的餘緒或傳統作為護身符，挾其所擁有的龐大社會和市場資源，影響政策走向，導致政策資源的投入，往往只流於助長「國進民退」的效果，造成市場壟斷或寡占。

其三、地方官員經常挾其所擁有的包括司法權在內的權力，掌握地方資源，並介入市場，在創造市場利益的口號下，為自己或地方謀利。

以上這3點，不只是導致大陸的市場失靈，而且也變成孕育貪腐的溫床和槓桿。因此，要針對市場失靈加以治理，就不只是純粹的經濟改革手段所能夠奏其效的，還必須通過政治改革才能克其功。亦即，反貪腐不只是涉及市場治理，還涉及敏感的政治改革。

薄熙來事件所揭露的大陸貪腐情況，著實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而從種種數據和跡象顯示，被揭露的貪腐事件，也許只是冰山一角而已。由薄熙來事件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大陸官員的貪腐，確實經常是藉著「唱紅打黑」等各種「社會主義」符號或名義的庇護下進行的。

因此，習近平所面臨的局面是：一方面既要繼續保持住社會主義的一些基本底牌，如對土地公有制的形式堅持，以便在儀式上保證大陸仍然是社會主義的國度；但另一方面則必須避免個人、個體、集團或單位藉「社會主義」招牌作為護身符，行以權謀私的貪腐情事。

以目前大陸的情勢來看，要中共改變對社會主義形式上的最後堅持，是不可能；但如果要治貪腐，恐怕又必須進行政治改革，以保證「社會主義」招牌不會被作為貪腐的護身符。

在另一方面，中共從鄧小平南巡以來的大陸經濟發展經驗出發，把「維穩」當作是中共首要的政治任務，並且將「維穩」進一步當作中共「維權」的辯護基礎。不過，這種將維穩和維權聯結起來的做法的歷史，其實還可以回溯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文革結束後，中共抓住大陸上下怕動盪怕亂的社會集體心理，就不斷打安定牌和維穩牌，而且還順著安定和維穩的邏輯，推衍出若要大陸安定和維穩，就必須維護中共的統治權威的結論。

從中共的邏輯來看，不管誰上臺掌權，對中共最有利的是，通過維穩以實現中共的維權。這種邏輯是一種保守主義的邏輯，但中共從歷史經驗出發，卻會將

其當作至高無上的政治邏輯。

習近平上任伊始，雖然藉著到廣東深圳南巡，宣示繼續改革開放的決心；但從以上的分析可知，大陸的改革開放是以政治上的維穩和維權為前提的。鄧小平時代是這種格局，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也是這種格局，習近平時代也將是這種格局。因此，習近平所走的路，也將是帶有保守主義元素的改革開放的路。

不過，這樣一條路，到頭來總會掉進一個套套循環的漩渦中，為了維穩和維權，就必須維持住中共的統治權威；但為了維持住中共的統治權威，中共就不敢開展進一步的改革，從而使得改革只能變成一些技術性的治標性的行政改革；但這無助於改變大陸以權謀利、以權干預市場，從而導致貪腐叢生的現象。目前，大陸拋出官員財產透明化的政策，這或許對鎮懾貪腐剛開始會起一定的作用；但是敢於貪腐的人，仍將有種種技術性的手段，應付或規避這種財產透明化的制度的制約。因此，這種手段仍然是治標的。

要治貪腐，仍然需要進行一些治本的政治改革。而其關鍵在於理順中共和國家機器與社會的關係，讓國家機器與社會相對於中共有一定的自主性。

目前，大陸已有人提出頂層設計式的改革模式。這些模式除了要求領導者要具有改革開放的決心和意志外，主要著重要求政治改革必須由上層建築開始解套，然後才能帶動由上而下的變革。

中共一直不願意推動治本式的政治改革，其實主要就是怕失權。不過，以大陸目前仍處在經濟成長仍將持續發展，綜合經濟實力將繼續擴大的情況，大陸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承受政治改革所帶來的社會政治變動的資本的。而以大陸目前的貪腐情況來看，若不加以治理，其所引發的動盪，就有可能超出中共的想像之外。貪腐可能是導致大陸不穩定的最嚴重的負面元素。維穩維權隱然已經成為大陸貪腐的溫床，習近平若要治貪腐，就必須改變維穩維權的方式，從而必須進行一些治本式的政治改革。

其實，所謂治本式的政治改革，並不如中共想像會造成激烈的變動。許多漸進式的政治改革早已被提出，其中要者如：其一、讓中共黨內民主更加周延化和精緻化；其二、擴大由上而下各級人大的差額選舉；其三、由村自治擴大到鄉鎮自治，實施選舉產生領導制。其四、將政協和人大逐步發展成類似上下院制的民意機關。

習近平上任之初，除了訪視廣東深圳，還有就是其所展現的親民近民的作

風，也引人注目。習近平個人的親民近民的作風，或許可以為其贏得形象，但習個人形象的建立，終究抵不過因為官員嚴重貪腐所造成的對中共形象及其政治權威的衝擊。因此，習近平恐怕還是得思考如何採取一些漸進，但有用的治本式的政治改革，期能起到治貪腐的作用，從而也能因此起到市場治理，讓市場進一步完善的作用。